

LENGZHANHOU DE ZHONGRI GUANXISHI

冷战后的 中日关系史

(1989-2006)

李建民◎著



中国经济出版社
CHINA ECONOMIC PUBLISHING HOUSE

LENGZHANHOU DE ZHONGRI GUANXISHI

冷战后的 中日关系史

(1989-2006)

李建民◎著

中国经济出版社
CHINA ECONOMIC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冷战后的中日关系史 (1989—2006) / 李建民著. —北京: 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7. 3

ISBN 978 - 7 - 5017 - 7834 - 8

I. 冷... II. 李... III. 中日关系 - 国际关系史 - 研究 - 1989—2006 IV. D829. 3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26085 号

出版发行: 中国经济出版社 (100037 ·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北街 3 号)

网 址: www.economyph.com

责任编辑: 王中梅 (010 - 68319110)

责任印制: 石星岳

封面设计: 中子画设计公司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承 印: 人民文学印刷厂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13. 875 字 数: 357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017 - 7834 - 8/F · 6838

定 价: 32. 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 68359418 68319282

服务热线: 68344225 68369586 68346406 68309176



作者简介

李建民，男，1969年6月出生，出生于吉林省九台市，本科、硕士、博士分别毕业于山东大学、吉林大学、北京大学，副教授。近年主要围绕国家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相互关系进行学术研究，内容涉及全球化与现代化、科技政策与科技管理、中日关系等领域。在国内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40余篇，其中14篇被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转载；出版个人专著两部；主持国家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1项、山东省社科基金规划重点项目2项、山东省“十一五”规划前期招标课题1项、山东省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1项。现在山东理工大学经济学院工作，担任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经济学院副院长。

目 录

第一章 绪 论	(1)
第一节 冷战后中日关系史研究的内容和起点	(1)
第二节 冷战后中日关系史的特点	(4)
第三节 冷战后中日关系史的基本线索	(10)
第二章 中日关系发展的新起点 (1989、6—1993、7) ...	(17)
第一节 冷战结束后中日关系发展的新机遇	(17)
一、冷战的结束	(17)
二、“六·四事件”后中国外部环境的恶化	(19)
三、日美离心倾向与政治大国战略的强化	(22)
四、经历了严峻考验的中日关系	(25)
第二节 中日高层交往进入新的历史阶段	(34)
一、中日两国迎来邦交正常化 20 周年	(34)
二、中国共产党总书记江泽民访问日本	(36)
三、日本天皇实现首次访华	(40)
第三节 中日经贸关系的发展	(51)

一、中日经济关系的波折	(51)
二、中日两国努力加强经贸关系	(54)
三、中日经贸关系的成就与问题	(60)
第四节 中日民间友好和文化交流的加强	(71)
一、民间组织积极推动两国关系的恢复	(71)
二、中日文化交流的加强	(75)
第三章 中日关系的大转折 (1993、8—1997、8)	(79)
第一节 日本政局的动荡与对外政策的变化	(80)
一、“1955 年体制”的崩溃	(80)
二、中国威胁论的兴起	(85)
三、日美同盟关系的“再确认”	(91)
第二节 中日政治摩擦的加剧	(98)
一、日台关系的发展与徐立德访日事件	(99)
二、日本政界的否认历史逆流	(108)
三、钓鱼岛问题	(128)
第三节 加强相互理解,促进中日友好	(141)
一、细川、羽田两届内阁的对华政策	(142)
二、着眼于未来,推动中日睦邻友好关系发展	(145)
三、两国人民努力维护中日关系的大局	(154)
第四节 中日在经贸、党际、安全等领域的双边关系	(164)
一、经济联系的加强与矛盾的显现	(164)
二、两国政党之间的交往向纵深发展	(168)
三、中日双方就防卫安全问题进行对话	(173)

第四章 中日友好合作伙伴关系的确立

(1997、9—2001、4)	(176)
第一节 中日两国关系走出政治低谷	(176)
一、中日两国为改善双边关系而努力	(176)
二、两国总理实现互访, 中日关系走出低谷	(180)
三、中国共产党和日本政党关系的新发展	(186)
第二节 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中日友好	
合作伙伴关系的确立	(190)
一、中日伙伴关系提出的背景	(190)
二、江泽民主席对日本进行国事访问	(194)
三、为发展中日间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而努力	(204)
第三节 日本加速向“普通国家”目标迈进	(224)
一、“普通国家论”的提出	(224)
二、日本强兵、改史动向的加剧	(229)
三、落实“普通国家”战略的立法措施	(246)

第五章 小泉内阁时期的中日关系

(2001、4—2006、9)	(263)
第一节 小泉执政时期日本所面临的内外环境	(264)
一、日本国内的社会与政治变化	(264)
二、国际环境的新变化	(276)
三、日本外交开始强化“国家利益”	(284)
第二节 小泉内阁时期中日关系的停滞与倒退	(288)
一、经济领域的冲突与摩擦	(288)

二、历史问题的争论与分歧	(308)
三、政治与社会方面的矛盾加深	(330)
第三节 为中日关系的健康发展而努力	(343)
一、中日两国领导人努力保持接触	(343)
二、政党与议会往来	(350)
三、安全关系的拓展	(367)
四、民间友好的新发展	(370)
五、大力加强经济合作	(381)
六、安倍晋三首相访问中国与中日关系转暖	(383)
主要参考文献	(391)
附录1 冷战后中日关系简明政治年表	(395)
附录2 冷战后中日关系的相关文献	(401)
后 记	(435)

第一章 绪 论

如何评价邦交正常化以来特别是冷战结束后的中日关系，是中日两国学者共同关心的课题。如何看待对方国际地位的上升，如何看待双边关系中的分歧，如何看待两国在地区及世界事务中的合作，是冷战结束后中日关系面临的几个焦点问题。围绕这些主题，对冷战结束后中日关系历史发展中的各种问题作出系统的归纳和整理，以使更多的人加深对这段历史的认识和理解，是写作这本书的主要目的。

第一节 冷战后中日关系史研究的内容和起点

冷战后的中日关系是一个内涵非常宽的研究领域，以此为基础的中日关系史的研究所涉及的范围也相当广泛。作为本书的研究对象，冷战后的中日关系史是自 1989 年以来，中日两国之间在政治、经济、安全、文化以及其他方面相互交往的历史，它是中日关系历史长河的延续和发展，也是中日两国冷战后各自对外关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具体来说，冷战后的中日关系史要研究的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中日两国的政治关系。包括中日两国的政府间往来、议会往来、政党往来以及各种民间组织和友好人士为发展新时期的中日关系而进行的各种活动。既有直接的双边接触，也包括中日两国政治领导人在国际场合的往来；既涉及中日两国间的问

题,也包括亚洲和世界上对中日关系发展有重要影响的课题;既有官方往来,也有民间渠道的沟通。

第二,中日两国的经济关系。经济合作是冷战后中日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政治关系具有一定的调节功能,可以减缓、防范中日政治关系的恶化。冷战结束后,中日两国经贸关系已经发展为货物贸易、技术贸易、相互投资、政府资金合作等全面的经贸合作,互补互利、形式多样、日益紧密和稳定发展的经贸合作关系已经形成。对这个问题进行系统研究,无论对中日经贸关系的发展本身,还是对中日关系全局的稳定都具有积极作用。

第三,中日两国的安全关系。中日间的安全问题是冷战后开始显现的一个问题,突出体现了中日两国在安全问题上的困境。安全关系集中表现在两国军事态势和国防政策之中。由于中日两国在钓鱼岛主权归属、东海油气资源开发等问题上存在着分歧,新的日美防卫合作安排中又以“周边事态”、“有事法制”等措辞突出了台湾问题,加上在一些地区和全球热点问题上的立场不同,因此如何看待彼此军事力量的增长,也是思考冷战后的中日关系时必须考虑的问题。

第四,中日两国的文化交往。中日之间的文化往来,早在中日邦交关系正常化之前,就以民间交往的方式展开,并成为中日交流最活跃的组成部分之一。冷战结束后,中日文化交流发展更为迅速,其范围涵盖科技、信息、教育、产业、旅游等文化领域,呈现出官民并举、以民为主,多渠道、多层次、多形式的崭新局面,不仅是当前联系两国人民感情的重要纽带,对中日关系的继续发展意义也不可低估。

当然,以上四方面并不是冷战后中日关系的全部内容,对它们的研究也不是孤立进行的,探讨政治关系、经济关系、安全关系、文化关系内在规律的同时,对这四大领域的相互关系作出解释和说明,也是本书试图完成的任务。

在研究冷战后的中日关系史时,必须明确的问题是如何对

“冷战后”进行界定。本书将“冷战后”的时间确定在1989年，除了认为冷战结束本身是个过程性概念外，主要还考虑了如下三个因素：

首先，把1989年作为“冷战后”的起始年份是学术界的观点之一。前日本驻华大使中江要介1992年9月在参加中国社科院主办的“90年代中日关系的课题”国际学术讨论会时，在发言中指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约半个世纪的时间中，在国际社会格局中起了最大作用的是称之为东西方冷战的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之争。美苏两极对抗的格局，自1989年末美苏首脑会谈后发生了根本变化，这一新形势一般被称为冷战的结束”。^①这说明，把1989年作为研究的起点，符合学术界对“冷战结束”概念的认识。

其次，1989年是日本平成时代的开始。1989年1月7日，在位62年之久的日本天皇裕仁去世，55岁的明仁皇太子继任为日本第125代天皇。裕仁天皇执政的前半期，日本军国主义先后制造了侵略中国的“九·一八”事变、“七·七”芦沟桥事变等近现代中日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在他执政的后期，整个世界处于冷战状态，中日关系的发展也深受美苏两极对立格局的影响和制约。明仁天皇的即位，意味着“昭和”时代的结束，日本历史进入了一个新时期，中日关系也可以真正地面向未来了。

再次，1989年对中国来说也有特殊意义。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出现低潮的大背景下，“六四事件”的发生，对中国的内政外交都产生了极大影响。西方发达国家以“民主”、“人权”为借口，对中国采取包括中止政府间高层往来、停止经济援助等措施在内的对华制裁，中国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良好国际环境发生逆转。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冷静观察国际形势，顶住内外

^① 中江要介：“世界新秩序的形成和日中关系”，《日本学刊》，1992年，第6期。



压力，开拓进取，努力扩大外交空间，为推进国家现代化建设、实现祖国统一，为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创造了新中国外交史上的一个新时代。

总结以上几点，我们可以说，以1989年“六四事件”为起点，对冷战后的中日关系史进行研究，是符合客观实际的。本书的框架结构，就是以此为基础的。

第二节 冷战后中日关系史的特点

中日关系的发展进程深受国际环境、双方国内政治经济条件以及两国间相互作用方式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冷战结束后，上述3方面的情况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中日关系的发展表现出了不同以往的新特点。

1. 开始摆脱双边关系束缚，注重在地区和全球层面处理相互关系

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中美关系发展的影响，但其结果却为中日两国克服冷战体制的制约从自身国家利益出发塑造相互关系提供了条件。1989年“六四事件”发生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采取了对华经济制裁措施。日本虽然迫于美国压力加入了制裁行列，却一再向西方表明日中关系的特殊性，强调与中国保持接触的重要性。在1989年7月的西方七国首脑会议上，日本首相宇野宗佑竭力说明亚洲各国最怕中国混乱、孤立、陷入排外状态，而极希望中国稳定。8月11日，日本新任首相海部俊树在首相官邸召开的首次记者招待会上说，中国永远是重要的邻国，对于中国现行的改革开放政策，日本将善意地予以合作，为使两国友好关系更深入地发展而努力。

日本政府所以注重日中关系，一个关键原因在于希望把日中两国关系提高到亚太地区乃至全球的高度来认识，为日本的国家

战略服务。海部俊树就任日本首相后，提出了建立“亚洲中的日中关系”、“世界中的日中关系”课题，希望中日关系的发展能够为世界和平与稳定做出贡献。在1991年8月海部首相访问中国时，对中国首都各界发表的政策演讲就是以“新的世界和日中关系”为题的。在这次访问中，中国政府宣布原则上决定参加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说明中国对日本方面对日中关系的新定位有相同的看法。当时世界舆论普遍认为，这是一次谋求将过去以两国间问题为中心的日中对话转变为要建立“世界范围内的日中关系”的访问，中日两国已经到了要为世界和平与稳定而积极发挥作用的相互交往时代。宫泽喜一内阁成立后，表示要以“为世界做贡献”为目标，建设“能够克服任何困难的坚韧的中日关系”。

1992年江泽民总书记在对日本进行访问时指出，中日两国加强友好合作，不仅将造福于两国人民，而且也将为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做出新的贡献，并以“国际形势和中日关系”为题做了演讲，全面阐述了中国政府对中日关系和国际新秩序等问题的基本看法。宫泽首相在欢迎宴会上强调，今天的日中关系不仅是中日两国之间或者地区性的关系，而且已经进入“世界中的日中关系”时代。1993年细川八党派联合政权取代自民党政权后，大力提升中日关系在日本外交中的地位，将中日合作从经济领域拓展到政治、安全领域，将双边关系推向亚太乃至全世界的合作。

可以说，冷战结束后，尽管中日两国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存在分歧，但是对中日关系在解决全球和地区问题重要性的认识上，立场是相同的，也是一贯的。1998年江泽民作为中国国家元首首次访问日本时，中日两国发表了继中日联合声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以后指导两国关系发展的第三个历史性文件——中日联合宣言，提出要面向21世纪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第一次以文件形式对“世界中的中日关系”做了定



位, 中日关系正式超出双边关系的范围, 开始朝着在地区及全球性问题上加强对话、协调与合作的方向迈出脚步。中日两国是世界和亚太地区的大国, 毗邻而居, 维护长期、稳定、健康的双边关系不仅符合双方利益, 也会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做出贡献。随着在地区及全球事务中相互合作的领域日益增多, 中日两国必将在世界新秩序的形成过程中贡献出自己的力量。中日两国“和则不仅两利而且利亚”, “斗则不仅两伤而且伤亚”, 这个评价同样适用于国际舞台上双方相互间的合作, 应该成为进一步发展中日关系的切入点。

2. 开始打破历史上形成的不对等局面, 双边关系向“强强并立”的方向发展

中日两国有着悠久的友好交往史。在过去的几千年中, 两国关系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不平等: 明治维新以前是“中强日弱”, 明治维新以后的近百年间, 则是“日强中弱”。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后, 中日两国关系开始向平等的方向转化。发生这种改变的基础是中日两国在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中地位的趋同。二战结束以后, 由于国际社会的压力和自身的战略考虑, 日本实行了政治上采取低姿态的“经济立国”国家战略, 并在20世纪60年代末和80年代末相继成为资本主义世界和全球第二大经济强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后, 尽管经济实力与发达国家相比有一定差距, 但是重新作为一个政治大国崛起, 加上中国拥有核武器等因素的影响, 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作用越来越突出。中日两国在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中的这种不同处境, 使彼此都对对方有着战略上的需求: 日本需要中国对其谋求在亚太地区乃至世界上发挥更大政治和军事作用表示理解和支持, 中国的现代化建设需要引进日本等发达国家的资金、技术和设备, 以改变近代以来的贫穷落后状态。这种深层的动因, 使中日两国在冷战结束的初期保持了相对稳定的友好关系。在各自国家的发展战略指导下,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 日本的政治大国化和中国的

经济大国化都呈现加速的态势，中日两国在综合国力方面日益走向均衡，两国关系也面临着质的变化，首次出现“强强并立”的可能。这既是两国改善和发展双边关系的机遇，也使相互关系的未来充满了矛盾和不确定性。中日两国政府和人民能否从过去的思维定势中摆脱出来，理性地看待双边关系的这一新的特点，是冷战后出现的一个新课题。简单地说，日中两国分别出现的“中国威胁论”和“日本威胁论”，日本如何对待 21 世纪中国的崛起，中国如何估计日本的政治大国化和军事大国化，是两国政府在进行有关决策时需要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中日两国决定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标志着双方政府已经意识到确立一种新的关系框架的必要性和迫切性，这是中日两国在历经 2000 多年不对称交往后为形成实质性对等关系而迈出的重要步骤，意味着两国关系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在新世纪的中日关系发展中，中日两国国力的均衡化仍然会保持下去，它对两国国家战略、外交政策和相互关系造成的影响依然是两国政府和人民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

3. 相互交往的具体内涵不断深化和拓展，友好合作的领域和方式变得更为均衡

冷战结束后，中日关系在经济、政治、安全、文化等领域取得了全面发展，无论在深度还是广度上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在政治领域，中日两国领导人交往频繁。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除了宫泽首相和森喜朗首相在任期间没有实现对中国的访问外，其他首相都对日本进行了正式访问。1998 年国家主席江泽民访问日本时，中日两国通过联合新闻公报的形式，确认了中日两国要加强高层对话，两国首脑每年实现交替互访，并开通政府间热线电话。与此同时，中日两国还积极利用国际多边场合保持密切的接触，对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经常交换意见。经济领域，中日两国互补性关系不断发展。在贸易方面，1993 年，日本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成为日本的第二大贸易



伙伴，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现在。安全问题在冷战后的中日关系中所占的位置越来越重要。总的说来，冷战后中日两国在安全上的分歧与不信任感增大，不过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成为双边关系发展的严重障碍。从1993年开始，中日两国外交当局重开有关安全问题的对话；1994年，中日两国恢复军事方面的安全对话；1996年新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签订后，中日两国安全问题磋商开始向高层次发展。1997年7月，桥本首相表示，为消除中国对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的担心，应该促进两国间的防卫交流，实现自卫队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互访；1998年，中日两国防卫当局首脑实现了互访；2002年3月中日两国首次举行副部级安全磋商，并酝酿军舰互访事宜。这些往来，对增进相互理解和信任，维护地区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具有重要意义。此外，中日两国在文化、科技、旅游、地方政府往来等领域的友好交流也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其范围之广，规模之大，数量之多，活动之频繁，内容之丰富，在中国同世界各国保持的双边交往中，都居于领先地位。2000年5000多人的日中文化观光交流使节团访问中国，2002年中日两国分别组成了5000人和13000人的庞大代表团到对方国家参观访问，两国还分别在对方举办了“中国文化年”和“日本文化年”活动。所有这些，都为增进两国友好关系和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起了推动作用。当然，在交往过程中也存在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需要两国政府和人民予以必要的关注。

4. 中日关系开始向“普通国家间关系”发展

日本是中国一衣带水的邻国。尽管在历史上曾经发生了日本侵略中国这样严重损害两国关系的痛苦经历，但在邦交正常化后直至冷战结束前，在求同存异的外交思维下，中日两国都非常重视彼此之间的“友好关系”，双方的分歧被暂时掩盖下去。冷战结束后，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和日本国家战略的调整，中日两国信赖关系减弱，日本方面逐渐淡化中日关系的特殊性。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国内民族主义呈上升趋势，日本

政府对华态度有所改变。一些人认为过去的对华友好外交是“迁就外交”、“谢罪外交”，与中国的关系应该是普通的国与国的关系，对中国该说“不”时就说“不”，要把中日关系变成“普通关系”，提出只有这样两国关系才能向成熟的方向发展。在中日两国发生严重政治摩擦后，建立“普通国家间关系”不仅成为两国学者比较一致的看法，而且有逐渐成为日本决策者主导思想的趋向。小渊首相的私人咨询机构“21世纪日本构想恳谈会”向日本政府建议，日中关系是东亚长期繁荣发展的重要因素，必须以“世界中”和“亚太中”的广泛合作为双边关系注入活力，同时要把日中关系变“特殊”为“普通”，以“务实”代替“友好”。其实，中日“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在本质上就是两国建立“普通国家间关系”的一种尝试。“中日间确立的伙伴关系框架，并不是70年代以来的中日关系自然延伸的结果，而是经历了一个内外环境变化→政治摩擦上升→两国关系新特点得到认识→双方调整相互关系这样一个曲折过程。同70年代以来的中日友好关系相比，中日伙伴关系更接近于一种不冷不热、彼此拉开一定距离的‘普通关系’”。^①

“普通国家间关系”是当事者按照各自的国家利益处理相互关系的一种交往模式，是一种正常的和符合国际惯例的国家间的“通常关系”，并不是从友好关系的层面上后退。客观地说，中日两国间的原则性分歧很多，过于密切的关系反而是不正常的，基于各自国家利益的中日邦交，才是正常的国家关系，一味讲“友好关系”，反而会掩盖两国间存在的许多问题，影响中日关系发展。特别是目前中日两国民众的认同感都在下降，如何使双边关系摆脱情感因素的影响向理性的方向发展，是我们必须注意的问题。在日本加速向“普通国家”目标迈进与中国和平崛起

^① 金熙德：“‘中日伙伴关系的’的背景、实质及趋势”，《日本学刊》，2000年，第5期。